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Moderne weltanschauung

现代世界观

〔德〕塔尔海默 (A. Thalheimer) 著 李达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一辑）

Moderne weltanschauung

现代世界观

〔德〕塔尔海玛（A. Thalheimer）著 李达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观/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736-6

I. ①现… II. ①李… III. ①世界观—研究—现代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12号

现代世界观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8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36-6/B.148

定价: 88.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德〕塔爾海瑪 (A. Thalheimer) 著 李 達 譯

現 代 世 界 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譯者序

這書是A. Thalheimer Einführung in de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Die moderne Weltanschauung.)的中譯本。這書的題目，原名現代世界觀，而內容却是辯證唯物論，所以德文本標題爲辯證唯物論入門，並於括弧內附註現代世界觀字樣。但我覺得還是用原名爲好，所以採用了現代世界觀的名稱。

這書本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出版的，直到去年冬天我纔見到這書的兩種日譯本（一是高橋一夫的，一是廣島定吉的），讀了以後，覺得原著者站在客觀的見地，就辯證唯物論作科學的說明和純理的研究，雖然譯成中文不過十萬字，而對於辯證唯物論的精義，却已經是扼要的簡單的明瞭的敘述了出來，這確是研究辯證唯物論的一本很好的入門書。在國內讀書界

開始研究着辯證唯物論的時候，這個名著實有譯成中文出版的必要，因此我決定要把牠譯出交由崑崙書店出版，並且崑崙書店也早已把出版的預告登了出來。但後來我因為個人的私事牽制，直到本年四月間纔着手翻譯，不料我剛剛譯完一半時，又害了一場眼病，延至六月以後纔能繼續的完成這件工作。在這個期間，空勞定購的讀者們的懸望，這是我應當道歉的。

這譯本最初是根據兩種日譯本着手的，後來經友人替我寄來這書的德文本，使我有對照改譯的機會，所以我自信這譯本或許不會和原本有多大的出入，除了有三五處經我故意刪去不關重要的幾句以外。還有一點我也應該聲明的，楊東蓀君在我恰好譯完這書一半的時候，他已把這書譯好，並且把全部譯稿都寄來了。同一著作出兩種譯本，原是很平常的事，在我既然決心要譯成出版，楊君的譯本也不妨另行付排，但因種種關係，這事

也沒有實現，嗣後與楊君商洽，楊君竟同意讓我的譯本出版。楊君的譯文是很忠實的，我這譯本的后半，參照了他的譯本的處所不少，我在這里特別說明。

這書的內容怎樣？讀者讀完了以後一定會明瞭，不過在譯者看來，覺得有略加介紹的必要，不妨附帶的說說。這書的內容，據著者在這書的第一章裏面說：「……以下我把辯證唯物論的前史、牠的完成、以及反對意見，簡單的列舉出來。至於辯證唯物論的自身，當然是本書的中心點。本書首先要研究的，是宗教問題。宗教問題是最根本的世界觀，其他一切世界觀，都是由宗教出發。其次是研究各種最重要的世界觀，在古代希臘印度和中國是怎樣發展的……。再次研究法國的唯物論……是因爲牠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有過貢獻。再次介紹德國布爾喬亞古典哲學發展中最重要階段，提出黑智兒和費爾巴哈。本書所以介紹這兩位哲學家，是因爲

他們……對於現代辯證法的世界觀，大有貢獻。最後我們通論辯證唯物論歷史的大體，再轉而研究歐美和中國現代最重要的精神思潮」。（見本書第十頁至第十一頁）由著者這段話看來，這書的內容，大致可以明白了。

這書出版以後，各國的學者們曾經加了許多批評，就那些批評綜和起來，除了有些人指摘牠的幾個缺點以外，大都把牠看作是關於研究辯證唯物論的名著。至於所指摘的缺點，我以爲是無關重要的。譬如說（一）本書論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幾章的分量太多，似乎沒有絕對的必要；（二）著者對於前文所豫定要講的法國唯物論，後文並未提起，似乎是一種疏忽；（三）最後一章，只把實用主義當作現代布爾喬亞哲學的主要思潮看待，似乎忽略了所謂理想主義的哲學，而且從辯證唯物論的體系說來，這一章似乎可以割愛。像這樣指摘出來的缺點，也不能說是不對，尤其是（二）（三）兩項。但（一）項所指摘的，我以爲在我們東方人看來，却未必就是缺

點。就東方的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哲學，開始作辯證唯物論的研究的，恐怕要算是這書了。這一點我們很是感覺興趣，並不見得就算蛇足。

總括起來說，這書雖然有些小小缺點，但是瑕不掩瑜，我們轉覺得這書的優點很多，那些小小缺點，我們可以容受的。尤其是本書的第七章到第十三章，是這書的主要部分，是辯證唯物論的發展和說明，也就是這書的精粹處，這是值得我們精讀的。我覺得這書的價值，並不見得要在蒲列哈諾夫的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和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論之下。

譯者識

目次

譯者序

第一章 宗教(一)……………一

現代世界觀的紛歧 自然科學的統一性——辯證唯物論的統一性——
反面——問題：辯證唯物論之史的發展——獨立研究的途徑——理論和
應用——辯證唯物論的兩個特徵——現代世界觀的兩個根本傾向——中
間傾向即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布爾喬亞的傾向之變態——本書的
程序——宗教是最古的世界觀——宗教的根本性質——自然現象之宗教
的與自然科學的說明——宗教的經驗是空想的加工和補充——宗教的
主要來源——一、人類對自然的關係——二、社會的關係——社會秩序

之宗教的確立——答布的規定——祖先崇拜和血族制度——僧侶階級是由社會的分工及階級形成產生出來的——當時僧侶階級的進步作用

第二章 宗教(二)……………二二

宗教的發展及其與生產形態的關係——地方神、種族神、民族神——世界宗教的基督教——原始基督教、奴隸及被壓迫階級的宗教——封建時代的基督教——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及其階級基礎——資本主義社會無秩序的狀態——宗教心、戰爭與革命——對宗教及教會而行戰爭的革命布爾喬亞——支配工具的宗教——宗教與農民階級——宗教與近代普魯列達里亞

第三章 希臘唯物論……………三七